

A Probe into Zhang Xuecheng's Concept of "Classical Prose Derived from History"

Xu Fu
fuxu1990@sdu.edu.c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Fu, Xu. . "A Probe into Zhang Xuecheng's Concept of "Classical Prose Derived from Hist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3, (4): pp.172-18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3/iss4/1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章学诚“古文辞由史出”说探微

伏 煦

摘 要: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提出“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穡也”之说,在“古文辞”中特标举叙事之文,以叙事之文出于史学,而史学源于《春秋》,建构了四部之学视野下的古文统绪。“古文辞由史出”说在章学诚的古文批评实践中亦有所体现,即引入史学义例,提高传记碑志等叙事文体的品格,直指其拘泥于浮词俗忌的弊病。“古文辞由史出”说实际上从属于章学诚贯通四部之学的理论构建,即“六艺”—“战国之文”—“后世之文”,对于“史”的定位,则与“六经皆史”说将“史”视作“先王之政典”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关键词:“古文辞”; 叙事之文; 古文批评; “六经皆史”

作者简介:伏煦,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250100。电子邮箱:fuxu1990@sdu.edu.cn。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别集编纂及其文学观念研究”[项目编号:21&ZD254]阶段性成果。

Title: A Probe into Zhang Xuecheng's Concept of "Classical Prose Derived from History"

Abstract: Zhang Xuecheng introduced the idea that "classical prose doesn't derive from history, just like food doesn't come from crops" in his *General 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enshi Tongyi)*. Within the realm of "classical prose", narrative prose holds significance importance and finds its origins in historical events, particularly those chronicled i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se event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dition of prose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Four Treasures. Zhang's concept of "classical prose derived from history" is further evident in his practice of classical prose criticism. He incorporates historical examples to enhance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genres, such as biography and epitaph, while also offering critiques of the limitations imposed by societal taboos and disingenuous language. In essence, the idea of "classical prose derived from history" aligns with Zhang Xuecheng's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aimed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Four Treasures, claiming that the "Six Arts" in the Warring State era and aft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re exists a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sitioning of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x Arts in the Warring States era and the viewing of "history" as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reflected in the notion of "Six Classics as works on governance".

Keywords: "classical prose"; narrative prose; criticism of classical prose; "Six Classics as works on governance"

Author: Fu Xu,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of Literature Theory and Aesthetic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Address: 27 Shanda South Road, Ji'nan 250100,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E-mail: fuxu1990@sdu.edu.cn.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21&ZD254).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作于嘉庆元年,1796年)篇提出“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穡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279)之说,程千帆先生疏之曰:“前人论文,皆言本经,

而《文史通义·易教篇》云:‘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是此云文辞出史,史已包经,与古亦不悖也。”(程千帆 121)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从其说,

言：“《文心雕龙·宗经》《颜氏家训·文章》皆谓文本于经，而章氏独谓文由史出者，盖以六经皆史（见《易教上》），经为史所包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285）二氏皆认为，章学诚以“六经皆史”之论，改古人“文本于经”为“文由史出”，虽将此命题置于章氏贯通四部的学术史论述中加以疏解，但不免忽视了《文德》篇自身的语境，以及章氏以史家义例论“古文辞”之用心。章学诚提出的学术命题，往往兼具多义性和隐喻性，故而本文从《文史通义》的学术语境出发，揭橥“古文辞由史出”说的多层意蕴，以此理解章学诚在四部之学视野下的古文批评观念。

一、“古文辞由史出”说的学理依据及旨趣

“古文辞”在乾嘉时代一般指有别于骈文和时文的散文，亦即唐宋八大家所倡导的“古文”。^①章学诚写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杂说下》，对“古文辞”这一概念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剖析，他首先指出：“‘古文’之目，始见马迁，名虽托于《尚书》，义实取于科斗。古者称字为文，称文为辞；辞之美者可加以文，言语成章亦谓之辞。”（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505）“古文”之名本于古文《尚书》，实指科斗文字；而“辞”兼指“言”“文”。在后文，章学诚进一步指出，“古文辞”之名于古义不合：“未有以所属之辞即称为文，于文之中又称为古者也。”“文辞”连属，则是汉魏以降之事：

自东京以还，讫于魏、晋，传记皆分史部，论撰沿袭子流，各有成编，未尝散著。惟是《骚赋》变体，碑诔杂流，铭颂连珠之伦，七林答问之属，凡在辞流，皆标文号，于是始以属辞称文，而《文苑》、《文选》所由撰辑。彼时所谓文者，大抵别于经传子史，通于诗赋韵言。（505）

章氏认为，“属辞称文”和东汉以后各体文章的繁盛有关，而“古文辞”之所以称“古”，则是六朝以后文体观念衍变的结果：“自六代以前，辞有华朴，体有奇偶，统命为文，无分今古。自制有科目之别，士有应举之文，制必随时，体须合格，束缚驰骤，几于不胜。〔……〕自后文无定品，俳偶即是从时；学有专长，单行遂名为古；‘古文’之目，

异于古所云矣。”（505）六朝文章虽有文质、骈散之别，然未以“古”“今”名义区别，而以“古文”之目区别骈文，则与唐代以降的科举考试文体，以及韩愈倡导“古文”有关。在章氏眼中，“古”之于“古文辞”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有一天科举考试文体不再是八股时文，那么“时文”也可能并入“古文”：“间有小诗律赋，骈体韵言，动色相惊，称为古学；即策论变调，表判别裁，亦以向所不习，名曰古文。斯则名实不符，每况愈下，少见多怪，俗学类然。充其义例，异日科举成文，改易他制，必转以考墨房行为古文矣。”（505—506）

尽管如此，章学诚也只能从俗，在《杂说下》篇末的小注中，他指出：“凡著述当称文辞，不当称古文；然以时文相形，不妨因时称之。”（506）“文辞”指东汉以后成立的各体文章著述，“古”则相对于科举时文，虽然充分表达了对“古文辞”这一概念不合古义的不满，但章学诚的认识大体符合清代的一般意见，这种不满也并未妨碍他在自己的论著中使用这一概念，如在《古文十弊》（作于嘉庆元年，1796年）开篇，章氏即指出：“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详哉其言之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504）

事实上，章学诚并未在《文德》篇对“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穡也”一说展开详细论述，因此我们必须参照其他篇章的内容，理解章学诚提出此说的学理依据，继而从《文德》篇的语境出发探究其旨趣。《上朱大司马论文》实则为章学诚专论史学的一篇重要文章，章氏由“昔曹子建薄词赋，而欲采庶官实录，成一家言；韩退之鄙鸿辞，而欲求国家遗事，作唐一经”之事，得出“似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的结论，既而论述文辞著述与史学之关系：

盖文辞以叙事为难，今古人才，骋其学力所至，辞命议论，恢恢有余，至于叙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为最难也。〔……〕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767)

章氏所论,“文辞”亦即著述“以叙事为难”,而“叙事事实出史学”。^②史学源于六经之一的《春秋》,由此可见,“古文辞由史出”说内在的学理依据,并非远绍刘勰、颜之推的“文本于经”说,同时因章氏所倡“六经皆史”,将“经”置换为“史”而成立。章氏将叙事标举为“古文辞”之最,而叙事之文实出于史学,史学源于《春秋》“属辞比事”,即《礼记·经解》所谓“《春秋》教也”(孙希旦 1254)的传统,经由《左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以降诸家正史一脉,传之于后世。“古文辞由史出”,实乃章学诚悉心建构、在文史之学视野下的古文发展脉络。

在作于嘉庆元年的《与汪龙庄书》中,章学诚亦申说了史学之于“古文辞”的非凡意义:

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故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盖古人无所谓古文之学,但论人才,则有善于辞命之科。而《经解》篇言“比事属辞,《春秋》教也”,[……]叙事之文,出于《春秋》比事属辞之教也。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马迁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辞之大宗。至六朝古文中断,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始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之所未喻也。近世文宗八家,以为正轨,而八家莫不步趋韩子;虽欧阳手书《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有闻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693)

所论“征实太多,发挥太少”的“近日学者”,显然针对精于考据经史之学的乾嘉汉学家;而后文批评韩愈及以韩子为宗的唐宋八大家,亦暗含着对继承唐宋八大家文统的桐城派的批评之意,并试图建立源自“《春秋》比事属辞之教”的古文辞统绪与之颉颃。章学诚以此建构别树一帜的文统,

其中蕴含了颇具章氏个性的学术判断,以此与风行海内的汉学家和桐城文人成鼎足之势。

必须说明的是,章学诚所说“古文辞”,包括汉魏以降代子史而兴的“文集之体”,并非仅有叙事之文一类,如《诗教上》(作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61)汇集辞章之作的文集,在清代往往兼备经、史、子三部之学,传记之文即出自史家。这一分类立足于清代文集的实际,未能全面地反映出章学诚“古文辞”的文体分类观念。而在编纂地方志的实践中,章氏倡导编纂文征以采摭“著述有裨文献”,“文辞典雅有壮观瞻者”,分为奏议、征述、论著、诗赋四类,即《和州文征序例》所谓:“征述者,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文人别集之中,应酬存录之作,亦往往有记传诸体,可裨史事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697)只是相对于辞命与议论,章氏特标举最不易为的叙事之文作为“古文辞”的代表:

《论课蒙学文法》: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叙事之文,所以难于序论辞命者,序论辞命,先有题目,后有文辞,题约而文以详之,所谓意翻空而易奇也。叙事之文,题目即在文辞之内,题散而文以整之,所谓事征实而难巧也。[……]序论辞命之文,其数易尽;叙事之文,其变无穷。(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415)

将“古文辞”分为辞命、议论(即论著或序论)和叙事三类,应当符合章学诚的本意。因此,置于“古文辞由史出”这一命题的“古文辞”,特指传记为主的诸多叙事文体。叙事之文“征实而难巧”,题旨蕴含于文辞而非题目之中,文无定体,变化无穷。而“古文辞”诸体,实际上亦可追溯至“六艺之教”,如《上朱大司马论文》所言:“《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其他《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易》学亦入官礼,而诸子家言,源委

自可考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768)将“古文辞由史出”具体溯源至“《春秋》流为史学”,符合章学诚一再申述的学术观念,也避免了借鉴《文心雕龙·宗经》《颜氏家训·文章》所持“文本于经”的观念,并引入章氏“六经皆史”之说,且以“史”易“经”而疏解“古文辞由史出”的做法,尽管在逻辑上颇为通畅,但与章学诚的本意似乎有较大的隔膜。

除了标举“古文辞”中的叙事之文,建立新的古文观念和古文统绪之外,“古文辞由史出”说,无疑蕴含着章学诚对史学的瞩目。在刘知幾所倡“才、学、识”,即“史有三长”(欧阳修 宋祁 4522)之外,别出“史德”并推衍至“文德”。写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史德》篇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219)“著书者之心术”,并非道德层面的要求,《文德》篇所言亦能印证:“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278)章氏所谓“文德”与“史德”,皆非为文作史者的个人品行,而是对待著述的态度,这正是章氏提出“古文辞由史出”的具体语境: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于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夫史学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穡也。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279)

从“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穡也”之说的上下文来看,韩、柳二氏以“心”“气”论文,章氏以此印证“临文主敬”的主张,具体表现则是“气摄而不纵”与“主敬则心平”;而“识生于心”“才出于气”,“学也者,凝心以养气”,又将“临文主敬”与“才、学、识”联系起来,既然“才、学、识”是“史有三长”,而《文德》一篇因古人“未尝就文

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278)而作,将“史”与“古文辞”的源流关系加以建构,就成了章学诚阐发“文德”之旨趣的必要环节。从《文德》篇的具体内容看,作者“临文主敬”与读者“论古必恕”乃篇之要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过多地展开讨论“古文辞由史出”自身的学理依据。就《文德》篇关注的核心问题而言,“古文辞由史出”说无疑体现了章学诚以“史有三长”和“史德”为古文家个人的理想素质,以及古文辞写作的理想境界。

二、“古文辞由史出”说与章学诚的古文批评

章学诚曾有意区别自己和刘知幾的史学研究宗旨,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家书二》指出:“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817)从“一家著述”和“馆局纂修”的区别而言,章学诚所属意的“史意”,实则为史学著述的宗旨,以及史学作为四部之学的渊源和旨归,在学术趣味上,与刘知幾《史通》综论史书文体及书法义例,确实“截然两途”。不过,章氏并未全然摒弃刘氏所属意的“史法”,今观《文史通义》中的《古文十弊》篇,将史学书法的义例引入“古文辞”,则从微观批评的层面,丰富了“古文辞由史出”说的内涵。

从《古文十弊》开篇的小序得知,与《文德》《文理》等篇“多论古人”不同,《古文十弊》意在论及近世作者,且其宗旨在于纠正《俗嫌》篇所谓“文字涉世之难,俗讳多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438)。《古文十弊》总结的古文辞之失,即“剜肉为疮”“八面求圆”“削趾适履”“私署头衔”“不达时势”“同里铭旌”“画蛇添足”“优伶演剧”“井底天文”与“误学邯郸”,民国学者刘咸炘曾批评古文家“每以浮词忌讳丧其真实”,并指出:“章先生论此最详,《文史通义·俗嫌篇》及《古文十弊》之一二五六八九、《杂说》上中所指是也。”(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10)由此可见,批评古文家因世俗忌讳而丧其真实,是章学诚作《古文十弊》的重要目的,在此过程中,以史学义例为准绳,纠正当时的古文辞之失,无疑是章氏秉持“古文辞由史出”这一理念的直接反应。^③

如“八面求圆”：

二曰：《春秋》书内不讳小恶。岁寒知松柏之后彫，然则欲表松柏之贞，必明霜雪之厉，理势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将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怀惭，则触手皆荆棘矣。[……]江南旧家，辑有宗谱。有群从先世为子聘某氏女，后以道远家贫，力不能婚，恐失婚时，伪报子殇，俾女别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于守贞殉烈，两无所处。而女之行事，实不愧于贞烈，不忍泯也。据事直书，于翁诚不能无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殇，是女本无死法也。[……]今制，婿远游，三年无闻，听妇告官别嫁。是律有远绝离昏之条也。是则某翁诡托子殇，比例原情，尚不足为大恶而必须讳也。而其族人动色相戒，必不容于直书，则匿其辞曰：“书报幼子之殇，而女家误闻以为壻也。”夫千万里外，无故报幼子殇，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无是理也。则文章病矣。人非圣人，安能无失？古人叙一人之行事，尚不嫌于得失互见也。今叙一人之事，而欲顾其上下左右前后之人，皆无小疵，难矣。是之谓八面求圆，又文人之通弊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504—505）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本为表彰贞女之节烈，然族人顾忌家翁伪报子殇之小过，将其改为报幼子殇，而女家误闻，于情理不通。章氏以儒家礼法反对未婚守贞与殉节，以及当时律法允许更改婚约的规定，指出家翁出于道远家贫，希望以子殇为口实解除婚约的做法，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并非大恶大过。族人不容直书，实乃小题大做；为一人树碑立传，而要求所有相关的人事毫无过错，未免求全责备；出于忌讳小过而文饰之，往往又有违情理。就读者而言，显然违背了章氏《文德》篇所提出的“论古必恕”的原则。

“每以浮词忌讳丧其真实”，不仅表现于记事，亦表现于论断，如“不达时势”所云：“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

于循吏传矣。”章学诚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盛节。”（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506）雍正年间的清廉官吏，乃一时政策所逼迫，并非出于个人自觉的道德操守，非不为也，实不能耳。若称其为清官循吏，实际与“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一样可笑，和“山居而贵薪木，涉水而宝鱼虾”一样蠢钝。章学诚批评“不达时势”之弊，与刘知幾《史通》所倡“随时”之义颇有相通之处，《史通·因习》篇主张：“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刘知幾 126）刘知幾所批评的“事有贸迁，言无变革”，即后文所述：“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斯必不然。”（刘知幾 127）刘知幾所批评的《汉书·陈涉传》沿袭《史记·陈涉世家》“子孙至今血食”的说法，虽与章氏所说“不达时势”之弊在具体实例上有所差别，但两者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之疵，颇有暗合之处。从《古文十弊》所提出的不讳小恶、洞明时势等主张来看，尽管章学诚没有直接借鉴《史通》所述的史学义例，但章氏并非全然不关注所谓“史法”，在《古文十弊》以及《俗嫌》的批评实践中，史学书写义例成为衡量古文辞优劣的准绳，又如“优伶演剧”之弊：

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人，不必尽能文也。[……]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贞烈妇女，明诗习礼，固有之矣。其有未尝学问，或出乡曲委巷，甚至佣姬鬻婢，贞节孝义，皆出天性之优，是其质虽不愧古人，文则难期于儒雅也。每见此等传记，述其言辞，原本《论语》《孝经》，出入《毛诗》《内则》，刘向之《传》，曹昭之《诫》，不啻自其口出，可谓文矣。[……]名将起于卒伍，义侠或奋闾阎，言辞不必经生，记述贵于宛肖。而世有作者，于斯多不致思，是之谓优伶演剧。盖优伶歌曲，虽耕氓役隶，矢

口皆叶官商,是以谓之戏也。而记传之笔,从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508)

章氏所反对的“优伶演剧”之弊,即传记作者不考虑传主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记其言则引经据典,以浮词失其真实。刘知幾在《史通·言语》篇中,亦指出类似的情况:“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其于中国则不然。[……]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为华语,[……]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刘知幾 140)北朝史书“记言”的经典化,固然有在意识形态上与南朝争夺正统的考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以浮词丧其真实,但从广义上归为“优伶演剧”之弊,亦未尝不可,毕竟起于行伍、奋于闾阎的名将、义侠,言辞不可能类于经生,故而文人记述其言,以合其声口为贵,追求辞藻与典雅,则有华而失真之过。

事实上,章学诚所倡“史德”为“著书者之心术”,他并没有像刘知幾在《史通》专设《直书》《曲笔》二篇那样,留心于史学的征实精神。^④那么,章学诚为何引入类似于史学义例的写作规范,来批评当时古文辞存在的弊端呢?窃以为,《古文十弊》第一则“剜肉为疮”开篇的一段话,实际上透露了章学诚全篇的写作旨趣:

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体,则胸中是非,不可以凭,其所论次,未必俱当事理。而事理本无病者,彼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504)

“剜肉为疮”所言事理无病者,乃“叙其母之节孝,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溲便无时,家无次丁,乃母不避秽褻,躬亲薰濯”。“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则是孩子作其母之行状,却“述乃祖于时蹙然不安,乃母肃然对曰:‘妇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章学诚认为:“本无芥蒂,何有嫌

疑?节母既明大义,定知无是言也。此公无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谓得体,而不知适如冰雪肌肤,剜成疮痍,不免愈濯愈痕瘢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504)从某种意义上说,“八面求圆”之弊中的忌讳小恶,亦是一种弄巧成拙的补救,故而不明大体,造成了不分是非,才是浮词忌讳于古文辞中不断滋生的根本原因,“丧其真实”乃是显而易见的后果。章学诚对古文辞的要求是在识古人大体的基础上,^⑤实现叙事、论事合于事理,对“不达时势”与“优伶演剧”二弊的批评,亦是同样的道理。

《古文十弊》所批评的“不知大体”与“未必俱当事理”,往往是拘泥于浮词与俗忌造成的,如《俗嫌》篇所云:“文字涉世之难,俗讳多也。”其篇所举例证,多有与《古文十弊》相通之处,如朱筠为《吕举人志》:“吕久困不第,每夜读甚苦。邻妇语其夫曰:‘吕生读书声高,而音节凄悲,岂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吕。吕哭失声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聪,我岂久不第乎?’由是每读则向邻墙三揖。其文深表吕君不遇伤心;而当时以谓佻薄,无男女嫌,则聚而议之。”(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438)章学诚认为朱先生以邻妇知音,来表达吕举人久困不第的心境,合乎事理,未有不妥之处;而时论以之为不避男女嫌疑,说明文章“涉世之难”。从《古文十弊》包括《俗嫌》所论及的古文辞性质来看,这些“涉世之文章”大多为传记碑志行状等叙事之文,具备一定的应酬和代言性质,与诗赋等抒情之作或表达个人学术思想的议论之作不同,这些为他人代作的文章非出于己意,又必须在一定范围内的公共领域传播,因而难免俗忌时嫌。在这种情况下,章学诚在《俗嫌》中的喟叹,在《古文十弊》中的讥刺,实际上是努力借助史学的书法义例,尽可能提高应酬之作的文体品格,以避免浮词与俗忌对古文辞内容及形式两方面的不良影响,使之流入拘忌而褊狭的境地。

就“古文辞由史出”这一命题而言,章学诚虽未在《古文十弊》等篇具体的古文辞批评中言及于此,但从其借鉴史法义例,及其中蕴含的“史德”来看,章氏的古文辞批评与“古文辞由史出”的观念密切相关,以《古文十弊》为代表的古文批评实践,为古文辞写作发凡起例,使其不仅仅停留于理念的层面,亦即章学诚所建构的学术史;而是

为“古文辞由史出”说在具体的古文批评乃至创作实践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就古文批评的角度而言,“古文辞由史出”的理念,亦使得《古文十弊》在中国文学批评的“指瑕”传统中别树一帜。《文心雕龙·指瑕》篇云:“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 [……]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刘勰 637)刘勰对曹植、潘岳的文章疵病的批评,停留在指出其语言不合于礼制之处,依然拘泥于浮词俗忌。而《古文十弊》则在指出语言疵病的基础上,尝试为古文辞创设义例,并以合于古人大体、于事理无病的准则加以衡量,从根本上指出了浮词俗忌对古文辞写作的危害所在,这体现了章学诚贯通文史的学术视野对于古文批评的积极作用,也是“古文辞由史出”说的一大贡献。

三、“古文辞由史出”说与章学诚贯通四部的学术史建构

作为一个具有多义性与隐喻性的学术命题,“古文辞由史出”一方面是章学诚建构的古文系统,即“《春秋》—史学—叙事之文”,另一方面又影响着章氏的古文批评观念,亦即将史学义例作为衡量碑志传状等叙事文体的准则,直指这些具有应酬文章性质的叙事之文拘泥于浮词俗忌的弊病。在乾嘉时代以考据之学为上的实证主义学风之中,章学诚一系列尝试贯通四部之学的理论建构极富个性,我们应当结合《文史通义》中类似的学术话语,更好地理解“古文辞由史出”说。

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经、史的地位无疑最重要,章学诚在《易教上》中所提出的“六经皆史”,在近现代经学地位下移和史学地位提升的学术史背景下,受到了广泛关注,^⑥也被前贤用以疏解“古文辞由史出”说;近年来,有论者指出,应当考虑“六经皆史”说所具备的“隐喻用法”,并注意章学诚提出的其他类似命题,及其所构成相互联系的网络。^⑦如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报孙渊如书》所言:“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迄

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721)此段论述为《易教上》“六经皆史”说张目;《与汪龙庄书》亦提及“经之流变必入于史”;《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写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提及“故六经以还,著述之才,不尽于经解、诸子、诗赋、文集,而尽于史学。凡百家之学,攻取而才见优者,入于史学而无不绌也。记事之法,有损无增,一字之增,是造伪也”,(406),则与《上朱大司马论文》中“似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相通,实与“六经皆史”说共同构成了章学诚经、史关系的完整论述。

类似地,经、子、子、集(亦包括经、集)与子、史关系,在《文史通义》中皆有讨论,即《诗教上》讨论“战国之文,[……]其源皆出六艺”(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60),“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61)。在阐发“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时,章学诚提出“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61)之说。整体而言,《诗教上》建构了“六艺”—“战国之文”(诸子)—“后世之文”(文集、辞章之学)的文学史发展脉络,亦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经、子、集三部之间的源流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将“子史”并称,并在《杂说》篇指出:“故诸子仅工文辞,即后世文集之滥觞;史学惟求事实,即后世类书之缘起。[……]子史不分,诸子立言,往往述事;史家命意,亦兼子风。”(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355)实际上,将史作为与诸子有着相似形式的著述,在“六艺”—“战国之文”—“后世之文”的统绪中,史亦从属于“战国之文”这一环节,^⑧“史”的加入,亦使得《诗教上》建构的这一历史脉络更加立体。从某种意义上看,除却经、史与史、集^⑨两组关系,章学诚所构建的四部之学互相关联的学术史框架,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六艺”—子、史—文集(即辞章之学),因而“古文辞由史出”所蕴含的古文统绪,亦从属于这一命题。同时,也隐含了“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的旨趣。

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从属于“六艺”—子、史—文集(亦即所谓“古文辞”)这一历史脉络的命题,“古文辞由史出”说实际上将“后世之文”的范畴缩小至叙事之文。如果古文辞同时包括叙事、议论、辞命等文类,这一命题不免与《上朱大

司马论文》中所谓“《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之说存在抵牾。但章学诚不仅从观念上推崇叙事之文,强调“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而且章氏的古文批评实践,亦着力于传状碑志等带有应酬交际性质、易于受到俗忌时嫌影响的叙事文体。章氏力图以史学义例为准绳,提高古文辞的品格。如果说章学诚以贯通四部为核心观念,全面而客观地建构了“六艺之文”——“战国之文”(子、史)——“后世之文”(文集、古文辞)这一文学史发展脉络,那么从属于这一脉络的“古文辞由史出”说,则主要是章氏学术个性及其独特价值判断的体现。

那么,以“文本于经”和“六经皆史”来疏解“古文辞由史出”,其症结究竟何在?“文本于经”之说源于《文心雕龙·宗经》,《颜氏家训·文章》继之,从《诗教上》的相关论述看,“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而“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尽管“战国之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章学诚也分别论述了诸子与六艺的关系——“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60),以及后世之文与诸子的关系——“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61),然而以“战国之文”沟通“六艺”与“后世之文”(即文集),与《宗经》所论“文本于经”说并无本质上的矛盾。而以“叙事之文”为代表的“古文辞”源于史学,章学诚又强调“史学源于《春秋》”,这在表面上,似乎合于“六经皆史”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厘清“古文辞由史出”与“六经皆史”的关系。

无疑,二说皆蕴含了章学诚以史学为一切著述的旨归之意,都具有相当的隐喻性,作为学术命题中的喻体,在具体的语境中,“史”所指代的本体却有所不同。对于“六经皆史”,正如章学诚在《易教上》一开篇所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1)而作为与子并称,即“战国之文”这一层面的“史”,恰恰处于“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60)的历史阶段。作为喻体的“史”,在“六经皆史”与“古文辞由史出”两个命题中,分别指代了作为先王政典而非私人著述的“史”,^⑩以及王官之学衰落后、私家著述兴起的“战国之文”。如刘

咸炘所说:“六经皆史。此史字只是记实事之称,非仅指纪传编年。”(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1059)具体而言,“古文辞由史出”的“史”,取法于《春秋左传》与《史记》,在六经之中,《春秋》的地位相对特殊,由孔子无位而作,《左传》“以史传经”,和《诗》《书》《礼》《乐》《易》相较而言,并非“先王之政典”;《史记》作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之作,在纪传体正史中最近于书之精神,亦不待言。混淆作为“先王之政典”的“史”,与自魏晋以降独立于经部的“史”,显然会给我们理解“古文辞由史出”与“六经皆史”两说之间的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

虽然章学诚曾提出“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但将史、子、集三部溯源于六经的说法,亦见其著作,如《上朱大司马论文》指出“盖六艺之教,通于后世有三:《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立言有本》(作于嘉庆三年,1798年)开篇,亦有“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358)之说,章氏颇以后世史、子、集三部,“得道体之一端”(借《诗教上》语),其中的“《春秋》流为史学”,“史学本于《春秋》”,更要将其理解为战国以降的史学著作,方能不与“六经皆史”混淆。

理解“六经皆史”与“古文辞由史出”两说之“史”的本质区别,或许可以参考章学诚在《书教下》中辨析《尚书》与《春秋》的论述:“《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49)六经之中,《尚书》与《春秋》被公认为后世史学的源头,虽皆为经典,但《尚书》作为“记注”无定法,而《春秋》作为“撰述”有成例,《尚书》在王官之学衰落后,不得不变为《春秋》及《左传》。由此可见,在章学诚贯通四部之学的建构中,“史”作为核心概念,本身就对应着史学发展历程中的不同阶段,这些概念本身并非变动不居,在具体的语境下有着各自的含义,只有回归到《文史通义》的学术文本自身,才可能作出符合章学诚原意和学术史本身的解读。古人对术语和概念的运用常常有一种不确定性,从现代的学术规范看,固然不够周密严谨,

却为现代的研究者带来了解读的空间与探求的乐趣,章学诚诸多学术命题所具备的多义性和隐喻性,正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结 语

在“古文辞由史出”这一命题中,章学诚有意缩小了“古文辞”的范围,而“史”的内涵则有不同层次,将其视为“史学”固然符合章氏整体的学术语境,而“史有三长”兼“史德”则是《文德》篇本身的旨趣。“古文辞”不仅“由史出”,其旨归亦在于“史”;又以史学叙事之义例作为衡量古文辞优劣的准绳,期以提高以叙事之文为代表的“古文辞”的品格。“古文辞由史出”亦是章学诚贯通四部之学的诸多学术命题的一部分,与“六经皆史”所描述的战国之前的王官至学有所不同的是,不妨将其视为《诗教上》所论述的“六艺”——“战国之文”——“后世之文”的学术史发展脉络的一部分,以此更好地理解章学诚贯通四部之学的学术理念。

注释[Notes]

① 曹虹《异轍合軌: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一文指出清初文坛反思明前后七子之失,消解了“古文辞”与“古文”的对立,唐宋古文传统再度恢复;到了清代中期,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标举“古文辞”的辞章之术,在桐城派内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清代骈散文抗衡交融的背景下,具有包容性的“古文辞”这一概念亦为骈文家所用。《文学遗产》4(2015):121—128。

② 何诗海《“文章莫难于叙事”说及其文章学意义》从文体疆域的拓展与叙事文地位的提高、古文和叙事的关系以及叙事之难等方面,对“文章莫难于叙事”说在清代的兴盛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文学遗产》1(2018):106—118。

③ “义例”本于《春秋》经传,杜预《春秋序》:“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706。

④ 章益国指出章学诚所关注的“心术之诚伪”所说的是“个人学术性格与当世学风”的离合关系,循乎本人性情的治学为“诚”,反之为“伪”;《史德》所言“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应该理解为贯彻天性,不屈从于他人,不违背自己,理解“史德”应该回归面向自己内心的语境中。故而学界从“史学客观性”来理解“史德”,有违章学诚的本意。参见《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412—418。

⑤ 何诗海《论清代文章义例之学》指出:“在章学诚看来,

史传是古文之源,也是古文正宗。所谓古文大体,也就是史传之大体。修史重义例,论古文自然重文例。”何文进进一步指出,清代其他文人如方苞、袁枚、恽敬等人,论古文学例义法也主要结合史传碑志等叙事文体。《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2(2012):190—200。

⑥ 刘巍总结了近现代学术史上对“六经皆史”说理解的两点分歧,一是能否解释为“六经皆史料”,二是“六经皆史”说是否蕴含了尊史抑经的意味,提出了以史代经或者以史抗经之说。参见《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6。

⑦ 详见章益国《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一书第八章《知识分类:从“六经皆史”到“四部皆通”》的相关论述。211—224。

⑧ 伏煦《章学诚“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说发微》一文从立言宗旨和专门之学两个角度,分别说明子书和史学的著述性质,两者从属于“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这一学术命题,均代表王官之学瓦解后,私人著述发展的历史阶段。《文艺理论研究》2(2017):94—101。

⑨ 章益国列举章学诚“四部皆通”所包括的六组关系之时,以《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的“文集者,一人之史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557),指出史、集两部的关系,其一是“以集辅史”,即《书教中》所言诸多文章总集“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41);其二是“文集即一人之史”。见《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220。

⑩ 章益国指出,今人乍听“六经皆史”,对“史”的初步理解一般是今天“史”字的用法:对往事的记录,从事历史编纂之人,以及历史编纂之成果,或四部中的“史部”,或现代的“历史学”“历史研究”等,但“六经皆史”的“史”是基于“史”的古义,是任事的官所掌的文献典籍,即“先王之政典”,进而取得“王官学”之义。《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225—233。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程千帆:《文论十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Cheng, Qianfan. Ten Essays on Literary Theory.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黄曙辉编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Liu, Xianxin. Liu Xianxin's Academic Writings(Lectures on Literature). Ed. Huang Shuhu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 :《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
[——. Works from Tuishi Studio (Expanded and Complete Edition).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2009.]

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Liu, Xie. Annotated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Ed. Fan Wenl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刘知幾:《史通通释》,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Liu, Zhiji. A 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 Generalities on History. Ed. Pu Qilo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9.]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Ouyang, Xiu, and Song Qi. New Tang Histo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Sun, Xidan. Eds. 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Book of Rit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Zhang, Xuecheng. Annotated General 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Ed. Ye Y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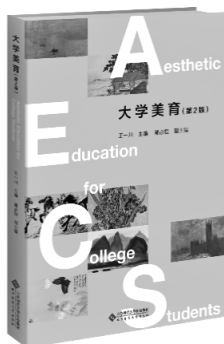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 General 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ewly Annotated. Ed. Cang Xiuliang.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5.]

(责任编辑:程华平)



· 书讯 ·



《大学美育》(第2版)

作者:王一川主编,郭必恒副主编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学美育直接与其人格养成有关。《大学美育》的主要特色在于从大学生人格养成方式出发阐述美育问题,目的是让美育真正成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人格养成途径。大学美育指依托美学知识体系对大学生进行自然美、社会美、科技美和艺术美等审美形态养成的过程,能通过丰富多样的审美案例赏析帮助大学生导向个体美好心灵的养成,其目标在于文心涵濡。其中艺术美育问题是论述重点,具体分为中国古典型艺术美育、中国现代型艺术美育、外来型艺术美育、艺术门类美育等。此外,本书专门就网络艺术美育以及教师角色与美育等问题展开了论述。

本书为第2版全新修订版,全彩印刷,配有教学课件,是为适应中国美育发展新趋势和新需要而编写的大学美育课程教材。本书另配有王一川教授主讲的“大学美育”慕课视频资源等。